

开创东亚现代化研究的新局面

——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李 文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于1994年11月7日~10日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东亚向现代化世界转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与交流。

一、审视东亚现代化的新思路

本次学术讨论会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建树主要表现在诸多研究都注重将东亚的变革置于近代以来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将东亚一国、一地的发展置于这一地区整体变迁中加以考察,从而产生了一些审视东亚现代化的新观点。

(一)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把握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的主题报告指出:1. 以东亚变革所处的既定的世界变革网络中所具有的边缘型现代化的新特征、及其所经历的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革命化与现代化四个过程为出发点,将东亚各国的现代化划分为日本、韩国、中国三种类型;2. 指出对战前日本的“成功”应持两点论,并强调在19世纪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时最边远部位的优势地位,走向了急剧海外扩张型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即以牺牲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为代价来高速推进自家的现代化进程;3. 在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中,新兴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忧患意识是推动东亚经济飞跃的最有力的精神因素;4. 现代“发展型”国家在促进社会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导向的一个重大因素;5. 西方文明的冲击导致作为儒学支撑的旧制度的解体,从而使传统儒学中包含的实践理性得以解放,并对东亚现代化进程具有独特的互动作用。

(二)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考察东亚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日本学者小林多加士和若菜隆的发言强调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边缘地区社会历史的结构对现代化类型的限定性。战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泰勒主义的积累方式,系以机械技术与低薪劳动结合,以生产流水作业为基础。此种外延式的积累方式为向海外行销商品需要将边缘地区殖民化,故边缘地区通常会借助国家力量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整合各种力量以对抗殖民化。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开始向福特主义和内包型转变,现代高新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以及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使发达国家大都以丰富的国内市场为推动力,国际贸易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贫困的边缘国家仅成了原料和资源的搜括对象,故此间实现独立的边缘地区诸国,只能选择自力更生型的现代化道路,实施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以发展独裁的方式促进国富。本世

纪6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又开始了在中心地区的信息革命、微电子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在周边地区移植性的微电子技术 with 低薪劳动相结合的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诸边缘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以跨国公司为媒介,通过大量低廉劳动力与新技术结合的途径形成出口加工业。故而1. 东亚超越国界与社会制度的多国地区合作取得进展;2. 原有的垄断发展体制逐渐为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三者同盟体制所替代;3. 地方政府开始扮演整合角色,民间企业成为运作的主要承担者。总之,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现代化正在明显地经历着由“国富主导型”、“国民国家型”、“工业化型”、“对抗型”向“民富主导型”、“地区圈型”、“后工业化型”、“共存型”转变,形成了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

(三)从现代化推进的顺序与过程分析东亚社会变迁的时空差异性。中国社会学家张琢对东亚现代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推进的顺序与过程提出如下见解:在农业文明时代,汉字文化的传播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今陕西,河南一带)逐步向四周辐射,呈波浪式逐步推进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其他周边地区,遂形成了包括现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汉字文化圈。而现代工业文明在汉字文化圈中的启动和推进则是由东亚沿海逐步向东亚内陆推进行的。具体说来,现代化在汉字文化圈中的推进从地域上可划分为五个梯次。1. 日本,2. “四小龙”,3. 中国大陆东部地区与朝鲜,4. 中国中部地区,5. 中国西部地区。并较具体地分析了与地区差相关的现代化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推进的差异性,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推进的不平衡性。

(四)从地域论的观点研究东亚地区内部的相互关联性。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地域论的观点考察亚洲的传统与变革,在重视东亚现代化内部动因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滨下教授认为,1. 探讨亚洲空间轴上的连续性的历史蓄积,可有助于解决横亘其间的诸如现代化等问题;2. 在亚洲历史上通过朝贡贸易表现出的“朝贡—册封”关系反映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对整个地域的影响与支配。朝贡贸易,作为历史上的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域的某种网络流传下来,同时也作为一种理念持续存在;3. “华夷变态”出现在长期的东亚历史之中,既显示为地域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交替,即“地政”与“权政”的交替,也表现为亚洲各地域诸国所共有的以“华”为中心的世界观,与称之为“夷”的异化作用之间相互转换角色的过程,从而赋予了将地域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而发挥作用的根据,形成了蕴藏于亚洲历史上的内在动因;4. 现今的华南经济圈、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与亚洲历史上的海域交易圈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二、对东亚现代化模式和经验的再探讨

与会代表较普遍地赞同日本学者竹内实、美国学者F·戴约、中国学者李慎之等人在会上提出的基本观点:东亚在向现代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大相同的现代化模式,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新经验与新概念,为人类全球性发展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对东亚的新经验、新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经济因素在下述两个方面得到了重视:其一是工业结构的调整。F·戴纳指出,导致以往亚洲新经济共同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便在于这一地区面对大众消费市场的标准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行销。而在当今全球市场趋向分散多变,多数国家国内市场均被外国资本、商品渗透的情况下,东亚地区若要继续保持其快速增长,就须象日本那样,采用便于小批量生产、不断改进工艺、产品和质量的、更具创新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体制,调整工业结

构,实行产业升级,注重人力资源的长远投资,且国家也须在发展职业教育,强制各公司进行技术开发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二是农业的发展。比利时学者吴逸荃通过对日本、韩国、台湾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研究,指出农业的发展对推进东亚现代化起到了以下作用:1. 经由土地改革,农业自下而上的发展维系和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发展;2. 廉价的粮食在工业化初期具有重要意义,适度的“剪刀差”是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3. 政府对农业的“剥夺”不应影响农村社区的发展,尤其是包括平均分配、重视教育和教育与就业间的关联性,公共设施对社区与外界的开放,改善基本生活条件与健康状况等在内的基本需要发展战略的采用,是亚洲诸国既合乎发展目的,又能对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途径。董正华关于台湾和韩国经济转型期农业制度的个案研究表明:自耕小农不计薪酬的家内劳动力的投入以及政府在投资、信贷、农业科技推广诸方面对小农的扶植,在维护了农村社区稳定的同时,还使农业生产在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得到较高速增长,从而在产品、市场和人力三方面对工业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结论是:小农制通过改造和调整,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之一;小农制下地权的平均化和政府对农民与农村社会控制的强化,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征。

(二)国家、政府在东亚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同样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萧功秦力主东亚诸国和地区的权威政体以及具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本国市场现代化导向特征的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政体与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在于对“北方威胁”的抵制,其功能则在于它本身所独具的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有效的调控能力,填补了在传统规范的约束力退出后,新的市场化力量和契约法制力量尚未形成时出现的“规范空白”,通过调动潜藏于东亚各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使之成为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基础,在客观上起到了在传统社会结构的离析和瓦解过程与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社会整合的反向作用之间的动态平衡作用。邓利娟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台湾在本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通过对庞大的“日产”的国有化,建立国营资本集中垄断的经济体制,以行政手段严格控制经济生活等“政府”的直接干预,50年代末60年代初重视市场机能,运用各种政府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的间接干预,使台湾宏观经济管理成功地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经济型”的过渡与转换,促进了战后台湾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工业化的顺利实现。而金明善和徐平则认为:正是由于日本明治以后未能对其政治体制作重大调整,使之朝着顺应工业化进程的民主政治的方向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才使军部法西斯恢复了传统的专制制度,造成政治转型的失败而中断了现代化进程。一些学者对权威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作用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三)本次会议关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问题的讨论,为现代化研究拓展了新领域。丘立本深入研究了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的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新经验,包括1. 采取坚决措施,改变以往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间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2. 有分寸地改变民族间的所有制结构以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发展;3. 调整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提出国家建设的新目标是把民族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许多学者都认为上述经验对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

(四)对儒家伦理、文化因素作用的重新认识。张少华指出:任何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间接的。儒学在长期遭受冷落后重新焕发发生机,并非仰仗文化自身的力量,而是借助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所谓的儒学复兴也不是向传统儒学的回归,而是对传统儒学的重新发

掘和改造,或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化。东亚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急剧变迁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确需文化的重建和整合。但东亚文化重建绝不能重新把儒学再次抬到“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是在发掘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进行精神文化的再创造。而严保云在他所做的一项关于韩国与台湾企业结构差异的另辟蹊径的研究中则认为:自本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正在经历M·韦伯所定义的诸如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精神和牟利、节俭、计算、敬业等资本主义精神的衰落,而战后东亚的特殊历史环境却在否定了儒教传统的同时为这一精神提供了一块良好的土壤。换言之,东亚的发展乃是一度曾推动西欧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重振雄威的结果,东亚最重要的经验恰恰在于它没有经验。

三、别开生面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

作为东亚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方面几近同时起步,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的史实,早已引发了若干比较性研究。本次会议在这一题目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一)关于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严立贤在他所做的关于中日两国原工业化、国内市场及其对近代工业化的影响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市场条件而仅靠自上而下的培植,工业化将不会成功。故虽然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下半页都在尝试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但两国的现代化结局却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确应到两国的经济结构中,即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寻找,尤其是要到原工业化,即机器工业出现前的,在家庭内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农村手工业生产中去寻找。作者用大量而翔实的史料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的原工业化是作为必要产品价值的生产手段而兴起的,中国农民缺乏剩余产品价值的情况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也未得到根本改观。社会经济水平的低下,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量过小过少,又由于过度增殖的人口消费了略有增长的社会价值,使原应成为剩余产品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又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必要价值,从而国内市场过于窄小,始终未能出现超越家庭范围的雇工和协作,即未曾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日本却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总产品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和增长,且由于地租水平变化不大,这些新增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以被作为剩余产品而留在农民手中,进而导致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原工业化的进深发展及其生产形式和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故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缺乏起动的可能性,而日本的工业化却在一定程度的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被日本政府自上而下地扶植成长起来。

(二)虞和平所做的关于中日银行业的比较研究,同样也强调了“自下而上”的意义: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起重大作用的诸多财阀集团和大公司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依靠银行的支持和扶助。近代中国的企业集团未能如日本那般迅速发展,在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也没有象日本财阀集团那样重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银行业自身实力薄弱,对企业集团的扶助程度多受限制。且中国的企业集团也缺乏自己的机关银行作为资金筹措的后援力量。故中日两国工业化同时起步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速度却不大相同,就经济因素而言,银行业所占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大不相同,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中日两国社会风尚的比较研究。在对近代早期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中,李长莉强调的则是中日两国的民间伦理在与近代西方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导致了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作者通过对职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诸方面上海和长崎通商初期民间新风习的比较分析,认为1. 中国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和职业的非固定可流动性,使上海在国

门初开不久便出现了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不仅导致了商业的畸型发展,而且削弱了业已相对稳定的商业职业伦理传统,妨碍了近代商业的健康发展。而日本四民身份和职业的固定非流动性,则使长崎在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时仍能保持传统的职业观,能够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而形成新的职业分工;2. 上海尚奢华之风而长崎则持节俭传统;3. 上海盛欺诈之风长崎却重忠义道德的重振。总之,长崎的社会结构及传统的民间伦理体系,在职业的使命感、理性化的职业伦理和社会的个人伦理方面与M·韦伯所说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精神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而上海在近代商业化的冲击下,却出现了非正统、非理性、非道德的状况,与近代商业化所需的时代精神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四)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所做的一项关于19世纪下半叶中、日、泰三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中,则强调自上而下的作用。该项研究指出,尽管中日泰三国在君主制国家政权的组织下几乎同时分别进行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幕藩改革与明治维新以及拉玛四世与五世的改革,但由于三国开国的时间、方式和外来压力大小的不同、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危机意识和改革主动性自觉性的不同,改革的具体动机目的和指导思想政策策略的差异,改革的深度、力度的差异,以及改革势力在掌握国家权力,改革领导集团的素质以及君主对改革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使改革呈现出了不同的效果,并对三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范广伟

书 讯

△国家“八五”社科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成果《苏锡常发展报告》(周海东主编,张明、侯星芳、王志良、王素萍执笔)已由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9月出版,全书47.50万字,定价:18.00元(平)、22.00(精)。

△张郢著《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全书33.7万字,定价7.35元。

△沈崇麟编著《实用社会科学研究计算机技术》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全书39.3万字,定价9.80元。

△郭莹编著《人生箴言》(冯天瑜主编中国智慧集萃丛书之一)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32.1万字,定价10.55元。

(张)

《中国妇女的现状》已于1995年2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萍主编,邀请全国妇联、民政部、卫生部、北京大学、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北京经济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有关专家合作研究,共同撰稿。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妇女的就业、文化与教育、社会保障、健康与保健、婚姻与生育、法律保障与法律意识及女性的违法犯罪问题、老年妇女状况、少数民族女性状况等。资料翔实,分析周延,评介公允。全书计9章,22万字。定价9元。

(新 园)